第七章

從家族研究看
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

本章論文是將越南華人視為一個整體來論述其歷史記憶特色，然後再以兩個家族歷史記憶的案例來討論。越南華人的歷史記憶在東南亞華人中的特色，主要是年代久遠、淵源流長，但是卻有明確的不連續性。做為中國鄰居的越南，歷代中國本土有難時，就有華人走避越南，故在越南有宋人（宋朝末年來到越南）、明鄉人(Minh Hương，以明朝為故鄉，明朝末年從中國逃到越南的人士)、清人（清朝時候來到越南）與華僑（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來到越南）各不同時期的華裔人士，各自保有不同的歷史記憶，由於相互間並不重疊，因此呈現不連續的記憶片段。文中主要以兩個家族的記憶為核心，分析其家族記憶的策略。這兩個家族分別是興安溫氏家族與會安羅氏家族，皆具客家背景，筆者曾親赴興安與會安，到當地考察家祠，採訪族人，同時對該地區的重大歷史遺跡進行對比，由個案家族到地方文史，討論越南華人歷史記憶的風貌。

這兩個家族的選取有其代表性，如果以地域來說，興安市(Hưng Yên)16 世紀即是越南北方的主要對外港口，直到清初仍是貿易大港。會安（Hội An）則是越南中部貿易大港，在十六及十七世紀，是世界各國商船雲集的貿易中心。[157]兩地一度都集結不少華人，後來兩個港口分別沒落，華埠也隨之式微，其後越南華人主要聚集的地方，轉而為南方的西貢堤岸及北方的海防，興安與會安雖然是沒落的地方，但因未受到民國時期華僑的影響，反而因此保留更多早年的遺跡與風貌，仍然可以追溯早期華人移民的家族面貌。因此就地點的選取而言，興安及會安，可以說是在現代華僑社會興起之前，華人社會在越南的重要據點。

記憶與遺忘

記憶的研究在 Maurice Halbwachs 在 1920 年代的著作開啟了新的研究範式，他發展了集體記憶的概念，並且以家庭、宗教團體與社會階級等，來對比不同環境的集體記憶，改變了過去將記憶視為個人心理作用的研究傳統。[158]因此集體記憶也是社會的產物，我們必須將集體記憶放在其社會脈絡來理解，尤其是應該將

---

[157] 選取兩個越南客家家族史，參考楊聰榮，〈銘刻與展演：從兩個越南客家家族史談越南華人的記憶與遺忘〉。《轉變中的文化記憶：中國與周邊》。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 年，頁 410-432。ISBN: 978-988-200-274-6。

[158] Halbwachs, Maurice,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in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L. A. Coser ed.,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25).

社會記憶放在與之相關連的社會關係中來理解，一個社會中對於哪些歷史會被記憶，哪些不被記憶，涉及一個社會建構記憶的過程。

在 Maurice Halbwachs 的論述之中，歷史與記憶是建立在對「過往」的不同的作用之上，記憶是屬於特定的群體，各自不同；而歷史則是有事實的基礎，具有普遍性，[159]開始於記憶與傳統已經消逝時。「集體記憶」並非先天賦予的，而是一種社會性建 構的概念，必須經過後天教育才能習得。例如二次大 戰即將結束之際，大量日軍在太平洋島嶼自殺，這種源自日本文化的認同感與殉道精神，便很難讓外人理 解，因為彼此未曾擁有相同之集體記憶。

記憶研究在二戰之後，因為戰爭的創傷而有了創傷記憶的研究，尤其是猶太浩劫(Holocaust)的創傷記憶研究，將記憶的研究延伸到歷史創傷的記憶，因此增加記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160]而從個人的創傷到民族甚至跨族裔的創傷，也將記憶研究延伸到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研究。這使得記憶與歷史的不同被凸顯，也將記憶研究與歷史研究拉進距離，原來記憶與歷史的形塑是互相影響、交互作用。當集體記憶於同質性團體中持續存在並不斷汲取力量

---

159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7-25, Spring 1989.

160 創傷記憶(traumatic memory)的相關研究，參考 Caruth, Cathy,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時，其實是身為「團體成員的個體」（individuals as group members）在作記憶。任何團體都擁有各自建構的獨特記憶，這其中當然是個體在進行記憶，但個體卻必須憑恃團體脈絡（group context）來成就自己過去的歷史。

與記憶的過程相對應，遺忘(forgetting)是記憶的另外一面。如果我們接受 Maurice Halbwachs 的邏輯，記憶是經由個人記憶與社會建構的交互運用，那麼遺忘也是經過同樣的過程。當某種事件或核心價值以一種習慣性儀式為社會所記憶，同時必然有事件意義或核心價值的某部分同時被遺忘。[161]歷史的遺忘則也是相對的過程，當某種歷史記述強調要記錄某一部分，則也有相對的遺忘部分發生。以下的討論會將記憶與遺忘並列，並且討論對誰是？記憶與對誰而言是遺忘。

越南華人的記憶策略 1--興安溫氏家族

現今越南的興安市(Hưng Yên) 為興安省省蒞[162]，古稱庸憲(Phố Hiến)，屬河港城市，位於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地帶，介於河內到海防中間，在清代是越南北部對外貿易中心。

---

[161] 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4.

[162] 越南行政區名詞，同省會、首府之意，一般指地方政府的行政中心。

興安相傳在越南始祖雄王時代就已經存在，[163]屬交趾(Giao Chỉ)地區，隋煬帝出兵討平林邑，置為沖、農、蕩三州，兩年後改為林邑、海陰、比景三郡，興安應屬林邑，也稱蕩州(Đằng châu)，直到吳朝(939~965)，前黎朝(980~1009)時改名為太平府(phủ Thái Bình)，陳朝(1226~1400)時又改為龍興府(lộ Long Hưng)，到了阮朝明命十二、三年間（1831~1832），才改置為興安省。[164]興安市的舊地名為庸憲(Phố Hiến)，是當時僅次於首都昇龍（河內）的大商埠。庸憲是上山南之行政首府，也是首都昇龍的外港，對外貿易相當繁盛，當地人稱古時越南繁華之處，「第一京師，第二庸憲」(Thứ nhất Kinh kỳ, thứ nhì Phố Hiến)，至今這個說法還為當地人所津津樂道。[165]

興安一度曾是重要的華埠，十六世紀初就有華人遷入庸憲地區，主要是經商，廣東（廣府）、潮州、客家、瓊州（海南）和福建漳州、泉州人士都有，庸憲當地的天應寺在後黎朝永祚 7 年(1625)所立的碑文稱之為「小長安」，到了十七世紀的中葉大批不願接受清朝統治的逃到庸憲地區，形成了華人聚集區(Bac Hoa) 。然而現

---

[163] 雄王是越南傳說時的始祖，現在的越南都尊崇自己是雄王的後代，但是歷史的記載相當模糊，其在越南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黃帝。

[164] 華林甫，〈中國傳統地名學對鄰國的影響：越南〉。《中國地名學史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268。

[165] Đoan Hùng, Nhân xem tranh mộc bản, suy nghĩ về một dân tộc "mù chữ". *Giao Điểm*, 7, 2004, p. 1.

在各主要的越南華人人口統計資料已經看不到興安的資料，[166]表示華人社群已經隨著這個古老小鎮的蕭頹而散去，庸憲早已經失去了昔日繁華，華埠不復可得。

筆者於 2004 年 1 月造訪興安，其地理位置約在河內向東行一百公里，過去雖曾是盛極一時的港口，但是荒廢已久，舊市區早已凋蔽，房舍古樸老舊，現在已經是一般訪客不會造訪的地點。當地政府致力在新市區發展，因此舊市區仍保留不少華人遺跡，如關帝廟、天后宮、協天宮、興安會館等，但是華人社區已經消散，留在當地的華人則早已同化為本地京族，無法由外觀或語言風俗等分辨出誰是華人。

透過興安當地人的介紹，得以訪問一位溫姓華人，名為溫德成。在其家中發現了一個保存良好的家祠，溫德成是溫氏家祠的主人，由於地處偏遠，興安溫氏家祠可說是在越南北部地區相當具代表性的傳統華人家祠之一。

進行訪問時，溫德成表示，祖上是由福建進入潮州府，故祖籍應屬福建，因而參加興安福建會館，但家譜上註明潮州府人士，由於地望是在潮州北部，實為今日所稱呼之客家人的祖籍地，應可推斷即為現在所謂的客家先民的後裔。但是在越南，溫家是以明鄉人(Minh Hương)的身份被認知。住家擁有一個很大的院落，

---

[166] 陳慶，〈越南華人的人口學分析〉，黃漢寶、陳金雲譯。《八桂僑刊》，第 3 期，2001 年，頁 59-62。

正對院門是廳堂，廳堂正面牆前供有祖先牌位，右側則為族譜碑刻。廳堂還刻有多幅楹聯，其中三副頗有意味：

『源出潮洲南海支流經五世，地居溫帶藤城德樹自千秋』

此聯顯示了溫姓華人家族的歷史淵源。雖點明系出潮州，但實際來自潮州北部，即為當時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地區。據推斷，溫家的先祖應為 18 世紀初從潮州移居到當時稱為庸憲的興安。

『半月煙波泛宅陶公宜小隱，憲南風物壽人橘井久傳家』[167]

此聯顯示出溫姓華人家族的職業屬性，除了從事商業之外，也是個中醫世家，家中至今保存有明朝《景岳全書》和清代《本草綱目拾遺》等醫書。

『薈得華裔中出來孔孟真傳軒歧妙談，況當財界上理會管商舊學歐美新聞』[168]

此聯同樣表明繼承華人儒家傳統，在商業、醫藥有其專長外，更顯示華裔溫姓家族在西力東漸後，在生存方式上的積極應對。事實上，據受訪者介紹，他們家族中的第四代已開始從傳承中醫轉而學習西醫。

---

[167] 陶公。係指春秋時楚國人范蠡，他退隱後經商有成，人稱「陶朱公」。橘井，係指出自《列仙傳》之西漢道人蘇耽，他利用橘葉泡井水救治疫病患者。在這裡是指祖上經商有成，以及投身杏林成為醫生。

[168] 軒歧指的是被視作中國醫藥始祖的黃帝軒轅氏及其臣子岐伯。管商指春秋戰國時代的管仲與商鞅，兩者皆進行變法改革，管仲重視商業，富國強兵。

溫氏家祠中

保大甲申年[169]溫譜記

聞之家有譜猶國之有史，皆示不忘也。興安城甫北和明鄉會，原前明鄉也，憲南繁盛之時，明人經商到此，五府會館，聚眾族以成，故曰明鄉。我，溫族即明鄉中一家族也，我十公即溫族中一世祖也。公本潮州府〇〇人，少時南來，取南人靈貴氏生五郎五女，故名第一郎。父正公後其子，移居建安，芝萊社別成一支，生齒有十餘丁口，三郎公，四郎公後其子他往未詳。五郎文德公生文婁，其後文婁從妻，貫遷居快州安曆社，今溫備溫佑兄弟生有子女八九人是其支派，現今我溫族在北和明鄉，則策武郎，親富公之所出也，公葉良醫生三郎孟公文好，仲公文弄，季公文午，季公無出，仲公只有二女，氏妙氏珠，孟公克承父業生二郎，長公文子，次公文整，二女氏銀氏雅，次公為人恬淡，通葉儒醫，二房生二男，能孝能讓，二女氏倩氏草，享壽四十八歲而終，長公省樸直風，與我母鄭氏聰專商為業，育我父欽一人，女四人，氏連氏川氏森氏巳等，各成室家，此我祖南籍以來至文欽之身歷歷五世矣，其間聚散合分不無致忱然，積功累德，一世世不遷，今各方別支所有之丁口，皆我祖憑籍之遺也，其光前裕後，為何

[169] 保大為越南大南國阮朝阮大帝阮福暎的年號，1926-1945，共計 20 年。甲申年為西元 1944 年。

如耶，我父文欽，生於成泰，甲午年，少時賦性好學，父母愛之命從叔父讀書，及十七歲，就外塾習，緣得數年，叔喪歸，談學力阻亦可惜，後以家因貧故思紹祖業，開小商店賣藥為醫，為父母服勞供贍，幸而生財有道，家用日餘，風雨一盧，漸已改色，無荷而我，父母以五十九歲捐塵，我母我孤晨，父依倚勤劬生意，稍見盈餘，癸酉年正月，日積集家貲，得有千數，猛然以昔當昔構，派志請予日謀建築祠堂，于所居後園，即我第一世祖買造之土居也，瓦屋墻內寢外拜，亦曰明求祀事，非敢圖為美觀，堂成正中合祀，高曾以下列位外家公土左右同，尊三炷爐香尉，然有愛見氣，聞之想像斯歆斯聚垂不今，日甲申，我母正康強七十之年，而我五十一，於十六歲娶茂楊社人阮氏善，生下三男，德書德詠德柄，二女氏詩翠峨，而內外聚孫，已經成行，並闔族叔季所出，生聚已有六七十人，而思昔之由一人，而今至六七十人，則今之六七十人安知不有六七百人之一日乎，我懼其愈遠愈疎，忘祖之譏，或所不色，爰於祠堂東壁竪一石碑，歷叙我溫於之嶺末，並世次諱忌墳墓二銘詳用垂弗手子孫，孫子升斯堂念斯其有思乎。

第一世貴公，字量合，號福誠，忌四月廿八日喪，安社，靈貴氏，諱釧，忌十二月廿三日，祀查蓋村。

第二世二郎，諱親富，號福明，忌八月三十日，喪安氏社，林貫氏諱井，號慈柔，忌六月初六日，喪安武社。祖姑溫氏馨，

忌八月二十一日。

第三世貴公諱好，號福誠，忌十月二十二日，葬下庸祠宇，陳貴氏，諱睿，號慈惠，忌七月十三日，葬下庸祠宇，叔祖欠弄，忌二月廿一日。裴氏惠，忌九月廿二日，父午忌十月廿三日，阮氏櫟，忌十二月初一日，葬下庸祠宇。

第四世貴公諱子，號會元，忌四月十二日，葬安武社，鄭貴氏諱聰，忌十月初一日，伯父路，叔父整，叔母鄭氏，河氏戎，叔父規，姑氏銀，氏尤氏雅，堂叔文章。

第五世貴公諱欽，號福滿，忌十二月廿八日葬祠宇。

第六世貴公胞弟文伯，忌正月十六日

第七世貴公溫

族長五世孫溫文欽拜敬

溫姓宗族在 1993 年建構祠堂時刻立碑文，碑文撰作者歷數宗族從中國遷移的情況，點明溫姓宗族為明朝時遷入的『明鄉人』，更特別寫明出身自潮州府。撰作者的父親溫文欽為當時的族長，出生於阮朝成泰 6 年(1894)，為溫家南來的第五世子孫。

興安被遺忘的歷史：宋楊太后廟

興安一地應該是充滿華人遷越記憶的地方，清末劉永福率黑旗軍在越南與法軍打仗，曾在興安一地互有勝負，最後才在諒山

擊敗法軍。[170]當 1949 國軍敗走越南，黃杰率領其第一兵團，武鴻卿統率由各部敗散官兵，臨時倉猝編成一師一旅，名為越南建國軍，最後即是在興安放下武器，其後遷往富國島，最後才回到台灣。[171]按理說，如果興安的華人與清末民國才形成的華僑社會接上關係，可以寫出來的華人歷史必定相當豐富。可考察現有的越南華僑史記錄，興安的華埠並未被提及。

究竟為何如此？在此選擇觀察興安一地與華人遷入越南的重要歷史遺跡，用來對比這些歷史如何被華人遺忘。在興安舊市區的邊上，有一座宋楊天后廟，是為紀念宋楊太后(Dương Thiên Hậu)而建，是南宋崖山海戰失敗後敗退至庸憲的宋朝遺民所建，越南文稱為「母寺」(Đền Mẫu)，有中文「聖母廟」之意，地點位於興安光中一帶，右邊是半月湖，左邊是紅河，風景秀麗，原來就位於庸憲(Phố Hiến)的市場旁邊，是關聯到宋人遷越的歷史遺址。

宋楊天后廟的廟門有一匾上書「協天宮」，應為該廟的正式名稱。前門口柱子上有一幅對聯：「節義門高仰止千秋泛揚應，綱常柱立屹然萬世顯靈聲」，橫額為「母儀天下」四個字。

紀念楊太后的廟，為何會出現在越南的興安庸憲？或許可以

---

[170] 柯劭忞等，《清史稿》，列傳三百十四，屬國二，越南。

[171] 黃杰將軍及武鴻卿、黃南雄兩位越籍領袖，由法方派機共同乘往河內請求保大擔保，全體官兵徒步到興安搭船下駛，後兩營區遷往富國島，直至 1953 年才得返回臺灣。黃旭初，〈國軍戰敗避入越南經過補遺——武鴻卿率領越南建國軍由龍州入越詳情〉。《春秋雜誌》，總第 274 期，1968 年，頁 38。

從楊太后的生平著手瞭解。時當南宋末年，宋度宗趙禥選了會稽楊氏入宮為美人，進封淑妃，後生下皇子趙昰。後來蒙古軍入侵南宋，南宋潰敗。舊部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傑的支持下一班文武官員，率十數萬軍隊，帶千餘船艦，簇擁著七歲的趙昰和其母楊淑妃，在福建省福州繼位，是為南宋端宗，楊淑妃被尊為皇太后。1278 年宋端宗逝世，由異母弟趙昺繼位為宋少帝。隔年宋軍在崖門敗戰，帝昺聞宋軍大敗，由丞相陸秀夫背負跳海而亡，楊太后得知後也跳海自盡。數日後，張世傑回來尋找帝室，才知宋帝昺已經跳海身亡，僅尋得楊太后遺體安葬。

至於宋楊太后是否曾到過越南？依正史的記載，楊太后並未有機會逃到越南。崖山應在現在廣東江門市新會區南約 5 公里，在南海與銀洲湖相接處，以現在古井鎮官衝村一個無名小丘為中心，北起銀洲湖，南至崖門口，方圓數十里的水陸區域，當地的國母墳有可能就是楊太后的陵墓。

宋將張世傑當時確實有其計劃，打算到交趾或占城後徐圖東山再起，但是張世傑本人在途中也溺死了，也沒有再來到交趾。不過在正史以外的記錄，則顯示楊太后的舊部，有到越南的記錄。張所南著《寧末遺民》載：「諸文武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別流遠國。」[172]宋將張世傑溺死後，他的餘部及部分百姓乘船百

[172] 轉引自黃仁夫編著，《臺山古今五百年》。澳門：澳門出版社，2000 年。

多艘，移居安南的交趾、占城及真臘等地[173]，人數達 3 萬多。

然而在越南的說法，卻說是楊太后的屍體漂浮到紅河口，到達現在庸憲宋楊天后廟的位置，因此民眾將其屍體掩埋在此。後來有一位來自北國朝廷(triều đình Bắc quốc, 指中國)游姓的太監，集合逃難來此的華人(người Hoa lánh nạn)，建立花楊村(làng Hoa Dương)。根據當地的資料顯示，目前這個村還在，宋人後裔也還住在這裡。[174]

按理而言，不論楊太后是否到了越南，宋楊天后廟應該都是華人來越的重要遺跡。至少在興安省，的確將宋楊天后廟視為重要的歷史遺跡，在官方出版的各種介紹中都列出了宋楊天后廟，筆者即是循此管道來到宋楊天后廟做訪查。然而，此處卻是華人罕至之地，也未曾聽聞越南華人社會特別提到這個地方。

證諸目前幾本越南華人歷史，包括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的《華僑志：越南》、[175]呂士朋的《越南華僑史話》、[176]周勝皋編著的《越南華僑教育》、[177]海外出版社編的《越南華僑與華裔》、[178]張文和

---

[173] 交趾是指越南，特別指涉越南南方。占城為當時占婆的首府，今日的歸仁。真臘是指柬埔寨。

[174] Lịch sử-Văn hóa Hưng Yên, *Đền Mẫu và lễ hội đền Mẫu*［宋楊天后廟與其節日］. Hưng Yên: 2004, p. 3.

[175]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華僑志：越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 年。

[176] 呂士朋，《越南華僑史話》，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編輯。台北：海外文庫出版社，1958 年。

[177] 周勝皋編著，《越南華僑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1 年。

的《越南華僑史話》、[179]與陳大哲的《越南華僑概況》[180]等等，都沒有將宋楊天后廟及宋人來越的事蹟列入，顯見宋人來越的歷史早已經被後來移入越南的華人所遺忘。

興安溫家與興安華人的記憶策略

興安溫家將祖譜刻在石碑上，置於家祠的廳堂側。這是溫家的記憶策略，在碑文中寫得清楚，「我懼其愈遠愈疎，忘祖之譏，或所不色，爰於祠堂東壁竪一石碑，歷叙我溫於之嶺末」，是為了怕後世子孫忘了而銘刻的。其主要的目的，自然是如碑文開宗明義所示，「聞之家有譜猶國之有史，皆示不忘也」。

這是最有效而傳統的記憶策略，為了記憶，將記憶的內容銘刻下來，使得家族的歷史由抽象的記憶變成具體的印記，從而有強大堅硬的物質性存在。與其他人只將家譜寫在紙上是大不相同，由於家譜銘刻在碑上，在歷經多次的變遷與劫難，興安溫家仍然可以保存其家族歷史。然而為了保存，也有所犧牲，家譜因而停滯於特定的時空，後世子孫繁衍也較難以增加上去，家族的記憶也就此固定下來，不能再增加。

---

178 海外出版社編，《越南華僑與華裔》。台北：海外出版社，1970 年。
179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75 年。
180 陳大哲，《越南華僑概況》，華僑協會總會主編。台北：正中書局，1989 年。

任何到越南旅行的華人並不難察覺，將文字銘刻在石碑上，是越南華人與越南人共同享有且慣常使用的策略。越南名山勝景，或是廟寺，到處都有石碑印記。不過，興安溫家的家族記憶終究還是遺忘了大半，在 70 年後溫家已經失去漢字的閱讀能力，溫家後人如今只知道有家譜以石碑形式留下，卻不知道其中確切的內容。由於越南歷史上十分獨特的語言文字轉換，使得這種有效而確實的策略反而有利於遺忘：因為有實體物質性的記載，反而造成文字的內容可以輕易地被忘却。

這種記憶與忘却普遍存在於越南各地，由於越南現行語言文字已經由方塊字轉為拉丁羅馬字母，所以儘管各地都有為數不少的漢字碑文，反倒無人在意。漢字碑文到處存在，被認為是一種傳統，多半保存完好。記憶是遺忘的開始，在越南出現不同意義的理解。

以宋楊天后廟為例，越南華人的歷史記憶，對於歷朝由中國進入越南的歷史，加以遺忘，所涉及的問題並不止於語言文字的轉換。宋楊太后廟也是以實物的存在，保持住某一種歷史記憶。宋楊天后廟的存在，原來是宋人舊屬在改朝換代之後，企圖以信仰的形式進行保存。其事蹟雖未被後來的華僑社會記住，卻以另外一種形式和意義保留下來，在越南的本地文獻中被保留，也為越南社會所接受，轉換成為「四位聖娘」信仰。換而言之，記憶經過轉換，被保存在越南的當地傳說之中，可知語言文字的轉換

雖非記憶或遺忘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被越南華僑遺忘的事實，又殘酷的顯示，改朝換代而帶來的意義變遷，才是歷史記憶最重要的殺手。

越南華人的記憶策略 2—會安羅氏家族

會安（Hội An）是越南中部一個著名的古港口，明清時期會安是各國貨運的中繼站，在各種旅遊介紹中都會說到這是越南最早的華埠。歷史上中國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都來此貿易，在這裡留下遺跡，而其中最早開發會安的是中國人和日本人。[181]會安離海 5 公里，在帆船時代，船隻直接入河直達市內。成為法國殖民地後，進入輪船時代，航運也改泊海港。法國人建築橫貫全越的公路和鐵路，經順化、蜆港直下，避開了會安，會安從此沒落。

會安有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與中國有深遠的淵源，中國的海上貿易，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海外第一站就是會安，也是古代占婆國使節前往中國進行朝拜的啓航港。會安成為東方貿易中心時，卻是中國開始實行海禁的時候，各國想要和中國貿易的商船都以會安為中繼站，可以說中國海禁成就了會安。貿易以中國的

[181] Chen, Chingho. *Historical Notes on Hội-An (Faifo)*. Carbondale, Illinois: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1974.

商船最多，中國商船帶來的商品有錦緞、紙張、毛筆、銅器、瓷器、陶器、銀器、金幣、銀錠、鋁、鉛、硫磺，而從會安購回胡椒、糖、木材、香料、魚翅、燕窩、犀牛角、象牙、黃金、蠶絲等當地土特產。

因此會安慢慢成為華人聚居地，中國商人在會安購買地皮，建築房屋，作爲銷售商品和收購貨物的場所。在會安城中，中國式的建築物到處可見，而且保存得很完整，既沒有遭到戰爭的破壞，也沒有因爲修建高樓大廈而拆遷。城裏有完整的華人聚居的街道，稱為唐人街，街道裏有觀音廟、關帝廟等中國式的廟宇，也有福建會館、廣肇會館、潮州會館、瓊府會館、客家會館和五幫會館等。由於完整保存了大量中國式古建築，以及日本式的建築，會安古街在 1999 年榮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會安在 16 世紀到 19 世紀時成為東南亞的貿易大港，以不同名稱存在在各國的記錄中，諸如 Fayfo, Kaifo, Faifoo, Faixfo, Hoai Pho 及 Hoi An 等。早期是占婆的一個城市，[182]是個河口，但占婆在西歐人士遠航到此以前即已經滅亡，留下的記錄並不多。後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等相繼航行到此，後建立固定的貿

[182] 占婆，越南文 Chăm Pa，占族人於西元 137 年至 15 世紀在今越南中部地區所建立的國家。有關占婆的歷史，參見喬治·馬司培羅(Georges Maspero)，《占婆史》，馮承鈞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

易航路。1535 來訪的葡萄牙人 Antonio De Faria 是第一位記錄會安的西方人。

會安羅氏家族

筆者在 2004 年 1 月到訪會安時，訪問了祖籍東莞的華人羅永耀，他的先祖大約 18 世紀後半葉移居會安，創建商號“天泰號”，經營中越貿易，從中國販運瓷器和中藥材到越南，再從越南把桂皮、茶、木材販運到中國。訪問時，羅永耀的商店仍高掛「天泰號」的匾額，是一家傳統藝品店，販賣旅遊紀念品。會安羅氏家族，為東莞客家人，來自廣東東莞寒村（或者韓村）。在天泰號後屋設有家祠，祠中保存有家譜，筆者詳細訪談其家族史。

羅永耀口述家族史概況如下：第一代為羅遇明（1785~1843），由東莞到會安，葬於會安內山 70 公里處，主要做林業及藥材，以桂皮為主，將桂皮及茶葉輸入中國，再進口中藥材。初到之時已經有東莞人在會安，為羅氏家譜中第二十世，夫人何氏先到會安，而何氏夫人一直留在會安，經營企業很成功，當時會安最熱鬧的街上，十之七八都是羅家產業。第二代二十一世則送回家鄉讀書，後為國子監生，任職清朝官員，因此沒有回到會安，最後葬在東莞。

其第三代子孫有一部分在會安，有一部分在東莞。目前在會

安的家祠主要都是留居會安者。第三世有三位留在會安，第四世則往不同方向發展，有回中國受教育者，擔任國民黨海軍軍官，另外有一位留在越南者，成為越南革命史上的人物，是個音樂家，名為羅梅，是越南時期的英雄人物，他作的歌曲成為革命歌曲，至今仍廣為流傳，原曲為中文，後來翻譯為越南文，是至今在越南廣為人知的音樂家。第五世則有參加越南革命工作者，曾為越南軍委，現在已經退休。

報導人羅永耀的生平如下：本人為羅氏在會安的第六世，在會安出生，在就學齡期間，為了躲避越法戰爭，舉家遷到山區，因當地沒有中華學校，所以轉入法文學校，回到會安時，時為 1953 年，已經 13 歲，只能進入越文學校。畢業後在中學擔任物理老師，後南越政府要求其參軍，故加入軍伍，由准尉入伍而上尉退伍，因為拒絕參加戰鬥，而被處罰，後來派到軍事學校。越共來後，被迫思想改造一年半。退役後無法找到工作，故先做體力工作，直到體力不濟，改到胡志明市工作，教授法文。由於兒子在會安開店，所以隨他回到會安至今。

在訪問羅永耀的過程中，羅永耀不斷提到這位成為越南革命史上的人物羅梅(La Hối)，以及由他作曲的革命歌曲《青年與春天》(Xuân và Tuổi Trẻ)。到了要告別的時候，羅永耀表示他打算唱這首歌做為結束。當場唱出這首歌，歌聲激揚清脆，頗為令人動容。

羅氏當場所唱為越文歌曲，越文歌詞請見附錄。因為原曲為

中文歌詞，故錄得中文歌詞(部分)如後：「青春流灌你身中，希望閃爍你眼中，那怕苦惱和病痛，那怕困難多重重……看春風，輕輕吹過大地；多少花，在枝頭一齊放，朋友你難道還不快樂？……」

經查中文資料，這首歌的中文歌詞註明是葉傳華作詞，羅允正作曲。羅允正應該就是羅梅，似乎在中文世界中多用羅允正，而越南文則多用羅梅(La Hối)。筆者查訪羅梅事蹟時，還有個小插曲，因為在筆者訪查筆記中所記載的姓名為羅開，是會安當地的華人告知的漢字。事後查詢各種資料都不可得，一度打算放棄，最後重新在越南文讀到 La Hối 的姓名，見其事蹟與所記載羅開相同，才將兩者連在一起。筆者以粵音發音，才恍然大悟。因為粵音的「開」字與越文的「梅」發音相近，讀為 Hoi，因此有此訛誤。

羅允正在日本侵佔越南期間參加秘密抗日工作，時為青年音樂教員，後來被捕壯烈就義，獨立後追認為烈士，葬於越南會安省清明亭的烈士墓。這首歌是有名的抗日革命歌曲，陳大哲在其《越南華僑概況》這樣描述：「這一首歌詞典雅、旋律優美的抒情舞曲，曾經是越南最長壽的金唱片。這首歌不但流行了五十年，而且傳播了五大洲，譯成了中、英、法、日語文。…四十年代當日本法西斯進軍越南的時候，這首歌成為了時代之聲，大眾之音，壓倒了『大東亞進行曲』的邪惡聲浪。歌曲唱出了大家的心中話，閃爍希望，戀愛理想，閃爍的是抗戰必勝的希望，戀愛的是復國

必成的理想」[183]

當初在越南訪談時候，尚未能充分理解羅氏家族的主人何以特意要唱這首歌曲，後來才發現，這首歌在越南實在很有名，雖是革命時期歌曲，傳唱至今，一般人也會唱。筆者詳查羅梅本人的生平，發現現今記載他一生事蹟，幾乎是與這首歌完全分不開，有的直接以《青年與春天》做為標題，例如阮文貴(Nguyễn Văn Quý)的紀念文章，標題是《青年與春天：紀念音樂家羅梅》(Xuân và Tuổi Trẻ- Tưởng Niệm Nhạc sĩ: La Hối)。[184]筆者翻閱不少越文歌本，都有收錄這首歌，都會附上作曲者的姓名羅梅。羅梅本人也作了不少曲，如 Xuân Sắc Quê Hương 等，但是難以和《青年與春天》相提並論，主要流傳至今，似乎只有這一首歌。然而一曲成名，一曲足矣，足以使羅梅短短二十五歲的青春，永垂不朽。

以下根據越文資料，簡單補充羅梅生平：羅梅， 1920 年出生，本籍廣東人（註：為廣東東莞人，客家背景），但祖上已經長期定居會安。羅梅在會安出生成長，自小聰穎，喜愛科學與音樂，14 歲開始作曲，得到當時人們的喜愛。1936-1938 年赴西貢，接受更多的學習與磨練。後來回到會安，在 1939 年集合音樂人，成立愛樂會(Hội Yêu Âm Nhạc, Société Philharmonique)，由羅梅擔任會

---

[183] 陳大哲，《越南華僑概況》。華僑協會總會主編，台北：正中書局，1989 年，頁 51-52。

[184] Nguyễn Văn Quý, “Xuân và Tuổi Trẻ- Tưởng Niệm Nhạc sĩ: La Hối”, Tưởng Niệm: Danh Nhân xứ Quảng. Tulsa, Oklahoma: những ngày đầu xuân tân tỵ, 2001, p.3.

長，時年二十歲，這群愛樂青年後來多成為有名的音樂人。羅梅頗富愛國情操，與朋友共同創作不少革命歌曲(khúc cách mạng)，其中《青年與春天》最為著名，流傳最廣。日本法西斯佔領越南後，得知羅梅為作曲人，遭日本憲兵隊特意逮捕並殺害。

會安被遺忘的歷史

關於會安的歷史，相對於越南方面的豐富記錄，中國方面的記錄就少得可憐。會安是當時海上貿易的重要據點，但是在中國相關航海貿易的書籍，很少提及會安。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早期中國的海上貿易，對於在位在北越的交趾，向來無航海通商的興趣，[185]這由海上貿易的記錄可以看出，如宋代趙汝適(1170~1231)所著的《諸蕃志》說到交趾，表示「交趾古交州，東南薄海……，歲有進貢，其國不通商，以此首題，言自近者始也。」[186]，而中國的貿易記錄，與現今越南中部，多以占城為交流點，占城應為現今的歸仁，與會安仍有一大段距離。而占城後來為安南所滅，這些事實都發生在西方人來會安之前。因此我們要討論會安的興起是否與占城的變化有關，尚待進一步的資料。

按理說，西元 5 世紀，會安即是古代占婆國的著名港口，會

---

[185] 王賡武，〈宋、元、明與東南亞關係的對比〉。《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1994 年。頁 119--頁 136。
[186] 趙汝適，《諸蕃志・交趾國》，楊博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安作爲一個海港城市，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了，按理說中國沒有理由不知道會安。或許因為會安並不是在中國的官方貿易路線上，所以相關記錄特別少。會安成為海上貿易的重鎮之後，已經是中國採行海禁之時。因此當時來會安的華人，其實是背棄朝廷命令者。明末清初僧人釋大汕曾在 1965 年訪問過會安，他在《海外紀事》[187]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會安唐人街：「蓋會安各國客貨碼頭，沿海直街長三、四里，名大唐街，夾道行肆比節而居，悉閩人，仍先朝服飾，婦人貿易，凡客此者必娶一婦以便交易。」若來會安的唐人仍穿著前朝服飾，表示在此之前已經到此，是前朝遺民。

現在我們對於會安早期歷史的理解，主要是來自西方航海家的記錄，[188]而非來自中國的資料。從這一點我們可以得知，僅僅依賴官方資料的歷史記錄，是如何的不足，會安因被歸類為私人貿易性質，因此在中國記錄上極為欠缺。王賡武認為，「關於這些社會集團由於沒有詳細資料，我們不知其詳，因為在中國人眼裏，這些社會集團不是合法的，故官方無記載。…。因而，我們只能通過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後是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最後

---

[187] 《海外紀事》共六卷，由明末江蘇人徐石濂於清康熙 35 年(1696)寫作完成，清康熙 38 年(1699)刊行。徐石濂明朝滅亡後出家，法號大汕，於清康熙 34 年(1965)應越南後黎朝廣南阮主阮福凋(1675~1725)之聘到越南弘法。

[188] 如 Chingho A. Chen, Historical Notes on Hoi-An (Faifo). Carbondale: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74.

是 1517 年(正德 12 年)明朝重開海禁後中國人自己的記述，比較全面地瞭解分布在會安(Faifo)等地的商人社會。」[189]

即使我們將中國海上貿易的官方記錄，拿來和越南的相關記錄做比對，也會發現雙方的記錄有相當大的差距。以鄭和下西洋的事蹟來說，鄭和七下西洋，七次都是以占城為首站。但是原為占城而為當今的歸仁(Qui Nhơn)，現在當地對鄭和一事並無記憶，[190]與東南亞其他各地，都有三寶公廟的情況大不相同，也與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華人，如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華人，奉鄭和為華人的守護神，或是開拓南洋先行者的舉措大相徑庭。在越南的主流歷史論述，以及越南華人的歷史記憶中，很少有鄭和的相關事蹟。這裡我們討論可能的原因，主要還是鄭和的事蹟，主要是和占城交流，而占城又被越南消滅，因此當今越南對於鄭和事蹟並不熟悉。

---

[189] 王賡武，〈沒有建立帝國的商賈——閩南僑居集團〉。《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1994 年。頁 91-頁 118。

[190] 一位出身越南華僑的香港青年，在 2004 年到歸仁住了將近一個月。他寫道：「博物館裡找不到鄭和的資料，我把「Trịnh Hòa」（鄭和）寫在手掌上，問一名博物館中年主管阿叔，他看了看，用手指托一托眼鏡，又仔細看一遍，連我的手背也翻過來看，他終於開口問我：「鄭和是甚麼人？」我說是六百年前一隊中國船隊的領導人。阿叔煞有介事的走到辦公室的桌子抽屜裡，翻來覆去，我以為他找到甚麼資料，卻見他弄出一部金錢龜背那麼大的太陽能計算機，我正想他不會做出「那件事」嘛，他居然就如我所想般按著 2004 減 600 等如 1404。他說公元 1404 年，不知道有甚麼中國人來過。」
資料參見 Pazu, Pazu's Asian Trip, 2004, (http://www.pazu.com/travel/trip2004/travelog/index00019.html)

記憶的策略

會安羅氏家族對於羅梅的記憶是採用歌唱的方式，這是對於一個音樂家表示敬意的最好方法，同時這也是越南這個社會記憶羅梅的方法。雖然是短暫的青春，卻因為音樂的傳唱而被記憶。我們特別注意，這是極少數具華人身份而被列為越南革命英雄的例子。雖然不少越人可能有華人背景，但多半是隱而不彰，要成為社會主流，更不會突出華人背景。這與越南有少數民族背景的人，致力凸顯少數民族背景的情況大相徑庭。

音樂的記憶與文字的記憶不同，這是一種因為文化展演而形成的記憶，由於音樂的傳唱，使記憶可以很容易地穿越族裔社群的障礙，而成為越南華人與越南主流社會的共同記憶。羅梅的特殊個案，因為適逢民族革命勃發時期，革命歌曲正好可以廣泛流傳，使得唱出時代心聲的一曲可以歷久不衰。從這個角度而言，文化展演在傳承記憶上，雖然不具物質性，反而更得以持久。

文化展演具有更深邃的社會記憶，在會安古城的現代風貌也可以看得出來。會安雖然在貿易上因為航運的轉移而沒落，卻在當代因為其所保存的文化氣息而得到新生。會安城所存在的中國、日本與西方國家傳統的風格，由於傳統保存良好，得以吸引各地旅遊者前來。會安本地的傳統建築已經在 1999 年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然而會安不僅僅是傳統建築的存在，存在的更是屬於東亞傳統的文化氣息，是活生生的文化傳統。

結語：家族傳承、歷史記憶與遺忘

本文提供了興安與會安兩個家族的個案，並以當地的華人記憶來討論越南華人的歷史記憶與遺忘。這兩個地方是越南與中國早年貿易交流的重鎮，有大量歷史記憶的素材，而卻只有一部分被記住，一部分為後人所遺忘。本文由這兩個客家家族的家族史記憶出發，分析其不同的記憶策略。興安溫家將家譜刻在石碑上，而會安羅家卻以歌曲的文化展演，展現出不同的文化策略。

記憶的傳承有賴文字的銘刻，這是傳統越南及中國保留記憶的主要方式之一。越南一地留下大量的石碑，成為歷史記憶重要手段。然而因為也經歷獨特的語言文化轉換，使得石碑一方面是記憶的手段，同時也是存封傳統的方法。而文化展演的記憶方式，因為易於跨越族群界限，而得到不同族裔的接受。文化展演的記憶雖然不如文字記載清楚明白，但這兩種方式都廣被接受，成為一種淵源流長、歷久彌新的記憶方式。

由興安和會安兩地對重大歷史事件的遺忘，則顯示了歷史研究的有限性。由於缺乏官方資料的記載，越南華人歷史事件早已為中土原鄉所遺忘了，但卻在遷入地越南存在不同的歷史記憶。

這兩個早期中越貿易都市所保有的歷史記憶，可以補充正史記載的不足，而由於中國與越南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記憶不相同，使得對於歷史的詮釋空間因而擴大，成為歷史與記憶交互作用中的案例。

參考文獻：

Bartlett, Frederic C., *Rememb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Boyarin, Jonathan, ed., *Remapping Memory: The Politics Of Time Space*.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4.

Butler , Thomas ed., *Memory: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Mind*. Oxford: Blackwell, 1989.

Caruth, Cathy,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en, Chingho A., *Historical Notes on Hoi-An (Faifo).* Carbondale: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74.

Connerton, Paul,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rian-Smith, Kate and Paula Hamilton eds., *Memory an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Austral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Deborah Battaglia, “At Play in the Fields (and Borders) of the

Imaginary: Melanesian transformations of forgett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8:430-442, 1993.

Engel, Susan, *Context Is Everything: The Nature Of Mem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Fentress, James and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New Perspectives of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1992.

Halbwachs, Maurice,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in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L. A. Coser e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Kuchler, Susanne and Walter Melion, eds., *Images of Memory: on remembering and representati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Lịch sử-Văn hóa Hưng Yên, *Đền Mẫu và lễ hội đền Mẫu.* Hưng Yên: 2004.

Nguyễn Văn Quý, "Xuân và Tuổi Trẻ- Tưởng Niệm Nhạc sĩ: La Hối", *Tưởng Niệm: Danh Nhân xứ Quảng*. Tulsa, Oklahoma: những ngày đầu xuân tân tỵ, 2001.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7-25, 1989.

Radstone, Susannah, ed., *Memory and Methodology*. Oxford: Berg, 2000.

Tanabe, Shigeharu, *Cultural Crisis and Social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Thailand and Laos.* Curzon: Routledge, 2002.

王賡武，〈宋、元、明與東南亞關係的對比〉。《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1994 年。

王賡武，〈沒有建立帝國的商賈——閩南僑居集團〉。《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1994 年。

呂士朋，《越南華僑史話》。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編輯，台北：海外文庫出版社，1958。

周勝皋編著，《越南華僑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1。

海外出版社編，《越南華僑與華裔》。台北：海外出版社，1970。

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75。

陳大哲，《越南華僑概況》，華僑協會總會主編。台北：正中書局，1989。

陳慶，〈越南華人的人口學分析〉，黃漢寶、陳金雲譯。《八桂僑刊》。2001 年第 3 期，頁 59-62。

黃仁夫編著，《臺山古今五百年》。澳門：澳門出版社，2000 年。

黃旭初，〈國軍戰敗避入越南經過補遺——武鴻卿率領越南建國軍由龍州入越詳情〉。《春秋雜誌》，總第 274 期，1968 年，頁 38-52。

喬治·馬司培羅(Georges Maspero)，《占婆史》，馮承鈞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

華林甫，〈中國傳統地名學對鄰國的影響：越南〉。《中國地名學史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華僑志：越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 年。